

从“请愿”到“示威”:抗战初期学生运动的转轨〔*〕

——以 1931 年北平南下示威团为例

周良书, 杨弟福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打压民众运动,由此激发大规模的学生反日爱国运动。在众多学生“请愿”团体中,由北大学生发起的“南下示威团”,因坚持进行“反政府”的“示威”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厉打压。但受其鼓舞,规模更为庞大的“北平南下示威团”又与国民党当局爆发激烈冲突,并最终以学生流血事件收场。此次运动不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也推动了学生运动转向同时具备“对外”与“对内”性质的“革命”斗争,预示着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

〔关键词〕学生运动;示威;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5.02.016

“请愿”“示威”是近代中国学生参与政治的主要形式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二者的界限并不明确。因此不仅这两个词汇常并列出现,还会与“游行”随机搭配使用,如游行请愿、游行示威、请愿示威等。但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各界民众的反日运动中,“北平南下示威团”的成员明确指出:“‘请愿’是合法的行动,‘示威’则为革命的斗争”。^{〔1〕}从“请愿”到“示威”,不仅标志着抗日战争爆发后,学生爱国运动的形式和内容发生变化,也为当时同样在阵痛中摸索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新的政治环境和历史任务,值得详加讨论。^{〔2〕}

一、“北平南下示威团”的由来

1931 年北平南下示威团之所以从一开始就采取“示威”的形式,并强调其“反政府”性质,既是基于五四以来学生运动恪守“合法请愿”的教训,也是学生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政府“卖国行为”的有力回击。

(一)“和平请愿”之教训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学生“游行示威”的开端。据张国焘回忆,其实早在 1918 年 5 月,北平和天

作者简介:周良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弟福,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高校党的建设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9ZDA012)的阶段性成果。

津学生就曾向政府行康有为“公车上书”式的温和请愿。其结果是请愿书最终只由总统秘书口头允诺代为转陈,请愿自然毫无结果。而一年后的五四运动就大不相同了。在这次运动中,学生们一面举着醒目的横幅游行,高喊爱国口号,一面辅以公开的讲演和演出,博得各界民众的同情和拥护。当时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学生、商人、工人也纷纷罢课、罢市、罢工,“全国各地亦有相同表示”。“舆情鼎沸,举国骚然”之下,才使“颀硕的当局”“不得不下令释放学生,并接纳学生要求”。^[3]

此后,学生群体频繁介入政治,更是几乎参与20世纪20年代所有重要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有一件事情出来,一定要打一个电,或是发一个宣言,或是派几个代表,而最无聊的就是一次两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4]虽然有人指出因现政府是一个“麻木不仁、体武穷兵、卖国或借款的政府”,“游街、罢课、请愿、乞援、开会打电报”等手段都“无济于事”。^[5]但此后数年,学生仍迷信和平“请愿”的形式,寄希望于政府能采纳民众意见,改弦更张。因此群众运动往往是“开大会”、发表决议案宣言若干、向当局递交请愿呈文,政府也“敷衍周旋”一番,以示“尊重民意”。学生之爱国热情有目共睹,然“惟于事实之本体则裨益至微”,“学生从中所主持之各种运动与所取之手段谓绝无进步”。^[6]

(二)从“请愿”到“示威”

1926年的北平“三一八”惨案,是学生的“请愿”由量变转为质变的标志性事件。1926年3月18日,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授意军警对参与爱国集会的民众开枪,致40余名群众死亡,伤者亦甚多。其中包括“女师大风潮”中的学生干事刘和珍等各校大学生30余名,另有3名中学生及各界人士若干。^[7]据王凡西回忆,在此之前北平学生的政治斗争形式,仍恪守“天安门开会及向政府请愿的一套”,在社会意义上未曾深化。而“三一八”惨案给“当时北京的情况以一种决定性的转变”,即用“热的铅和红的血”,结束知识青年们对“当局”的一切美好幻想。^[8]学生们的鲜血震惊了社会各界,无论是谁,都万万想不到政府会“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但扑倒在“同胞的枪弹”、喋血于街头的爱国学生,反被执政府污蔑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的“暴徒”。^[9]对此,北京各界人士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将牺牲者奉为“烈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执政府“残虐的行为”正式宣告北洋政府合法性的丧失。刚从国外留学归来不久的刘炳藜,在惨案后高呼“真正的革命者,必不请愿,尤其在腐败的政府之下不去请愿”。“请愿”与“革命”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是自相“矛盾”的,“请愿就是妥协;请愿就是投降;请愿就是自费气力,白牺牲”。^[10]部分学生更将段祺瑞称为“帝国主义的老走狗”,又将鲁迅“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血债必须以同物偿还”等言论作为檄文,投身国共两党领导的大革命,力求推翻北洋政府。^[11]而在1927年国民党掌握政权后,历届民国政府也均有以武力镇压乃至虐杀游行民众之事。这又成为学生采取更激烈的政治行动的根据,导致此后学生运动的政治色彩、学生与当局冲突的“烈度”越来越强。

(三)示威团研究的“个案价值”

在20世纪30年代频繁爆发的学生运动中,北平南下示威团的运动规模虽不是最大,死伤学生也不是最多,但此次运动的爆发却标志着学生们由“合法请愿”向“反政府示威”的根本转变,开启了现代学生运动的新阶段,因而具有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独特价值。

首先,北平南下示威运动最初是由北大学生单独发起的,具备较强的自主性和象征意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先是开展“清党”运动,大肆屠杀“左”派青年,后又全面禁止民众运动。许多青年也已对“革命”绝望,认为国共等党派争斗不休,自己已无力辨别“究竟谁是对的,谁能领导革命成功”,决心此后“只有看看小说,谈谈恋爱,陪爱人作乐”,而不再过问“政治”。^[12]而且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之下,中共在高校的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各种学生组织也被查禁或解散,学生界一度冷冷清清,学

运更是一度陷入低潮。^[13]但在民族危机之下,北大学生仍自觉行动起来,不仅在事前发表宣言,在运动中顽强斗争,更在事后积极反思总结,展现出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一定的理论素养。

其次,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学生团体相比,示威团具备明确的“反政府”性质。此次的示威运动虽是受日本侵略中国所引发,但同时具备“对外”与“对内”斗争的双重性质。北大学生强调“请愿只是当政府与人民站在同一的立场,政府相当地是人民的政府,只当那种时候,才有他的意义。这时,请愿是民意的表示,是人民督促政府实行某种政策的正当手段。但是,当政府不代表民意,反变成镇压民众剥削民众的工具,政府非但不能代表民族的利益,反变成民族利益的叛变者,做帝国主义的奴才时,向这种政府去请愿是表示对现状的盲目,是表示对统治者无望的依赖,是无政治意义的行动。”^[14]

因此,与同时期其他地区学生仍对当局抱有幻想,恪守“合法请愿”不同。北平南下示威团自成立伊始,就力图通过学生的率先反抗,“使全国民众运动一致汇合起来”,“反对卖国政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期间,更是坚持原则,强调“别的学校如请愿,我们决不参加;但倘他们请愿后加入我们来示威,则极所欢迎”。^[15]也正因此,通过此次示威运动的示范作用,“请愿”与“示威”的区别就此深入人心,并规约着此后的学生运动形式。

最后,此次示威运动持续时间较短,但其由北大一校发起,发展为北平地区各校学生与当局激烈冲突的过程,可以视作抗战期间频繁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之预演。“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反日运动大致经历“请愿”和“示威”两个阶段,从9月下旬至11月底为“请愿”,12月则多为“示威”。其中,12月1日由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单独组成一个南下示威团到南京去示威”,是“斗争形式转变的开始”。而紧随其后,12月4日之后,由中共党团影响下的北平学联发起并领导的、北平各校学生组成的“北平南下示威团”不仅承继“示威”的形式,而且也将斗争形势发展到新阶段。^[16]

在此期间,学生内部的分化与斗争十分激烈,国民党、共产党、国家主义派等各种势力也都试图影响和领导学生。学生们之所以不抗拒学生运动背后的政党运作,是由于他们在统一的“反日”诉求和爱国情绪之下,对于要采取何种斗争形式本无定论。正是因为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搪塞、欺骗、镇压,才使越来越多的学生逐渐放弃“请愿”的形式,转而支持非法的“示威”运动。此次运动的结果虽与“三一八”惨案类似,以政府对学生的武力镇压告终。但学生由“请愿”到“示威”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合法运动进到革命斗争”,二是“从单纯的对外斗争(反日本帝国主义),进而为对内斗争(反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17]

二、“示威运动”及国民政府的应对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始终对日态度暧昧,对学生们的请愿虚与委蛇,致使各地学生运动日趋激进。至11月下旬,南京政府决议牺牲东北三省与日妥协,北大部分学生遂断然抛弃“请愿”形式,南下“示威”。受其鼓舞,北平各校学生亦南下声援,并演变为国民党与“北平南下示威团”的流血冲突。

(一)“北平南下示威团”的出场

在当时各地的学生反日运动中,斗争最为彻底且最富理论色彩的,当属由北大学生发起的“北平南下示威团”。此前北大学生也曾寄希望于向政府请愿,600名学生曾于11月10日去晋谒张学良请求抗日。^[18]在对当局彻底失望后,校内学生还就愿意南下“示威”分为两派。^[19]但在11月30日的北京大学学生大会上,关纾等几名国民党学生蓄意扰乱会场,反而激起公愤。部分激进学生决定抛开服从当局“戒令”的学生会,另起组织(后被称为“非常学生会”)。并停止旧的“抗日救国会”之活动,从即日起罢课、组织全体同学南下示威。12月1日上午,示威团先遣队一行230人乘车赴南京示威,

并在火车上开会选举出“代表团”作为领导机关。又选定正副两名“总指挥”，并将其余同学分为四个大队（各辖5个小组），分别负责宣传、联络等工作。在其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学生们强调此去是要“命令政府”退出国联、“立即全国总动员对日本绝交”。如果政府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执行这种决议，反而去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者，则“我们非但不信任它”，还要“联合起来打倒它”！^[20]

从“外交”到“内政”，再到将矛头明确指向政府，标志着北大示威团的性质与其他“请愿”团体截然不同。12月3日先遣队到达南京后，立刻被中央党部派人集中安置。4日晨，学生们发现宣传材料被卫戍司令部扣留，遂在中大抗日会招待新闻记者说明来意，希望舆论界施以援手。因学生在文书中明确表示“请愿”与“示威”不同，二者“不仅是名辞上的差异，而是完全不同政治意义的运动”。前者是合法的行动，“表示对现状的盲目和对政府无望的依赖”；而“示威”则为革命的斗争，是“表示人民的力量，给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以一个威胁”。^[21]加上示威团学生早已决定到南京后，“决不向任何政府，任何人去请愿”，只去“向日本帝国主义者示威，同时亦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示威”。具体活动则是通过“游行、演讲、撒传单、贴标语、唤醒民众，一致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当局遂派人连夜去与代表团交涉，告知示威“不合法理”。并质询北大学生：“人家都是请愿，独你们来示威，不‘反动’还是甚么？”^[22]

对于当局把“示威”改为“请愿”的命令，学生们坚决不从。12月4日，继先遣队而来的北大学生示威团大部抵达南京，并与受其鼓舞的各地学生接洽，约定统一领导、集体行动。国民党当局则严阵以待，5日晨，卫戍司令部出公函警告示威团停止一切活动，否则将“加以正当之制裁”。但学生们不为所动，后在游行途中被军警包围，180余名学生被捆绑、押送至兵营约束。学生们一致决定在“政府未恢复我们的自由以前”，“以必死的决心”，“一致绝食，以示抵抗”。国民党则登报称此次事端纯属学生“无事生非”，并于6日深夜将示威者强行押解、遣返北平。^[23]“留京”（南京）的北大示威团成员即“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南京坚持斗争，同时另派代表赶赴上海等地进行串联。期间根据局势的发展，北大学生在《北京大学日刊》连日发表公告，力证示威团“合法”，^[24]更于8日号召全体留校学生赶赴南京。^[25]10日，北大示威团联合滞留南京的各地学生，进行5000人的游行示威。11日下午，北大示威团大部分成员启程返平，留下由18位同学组成的“留京代表团”继续未竟之工作。^[26]

（二）事态演化及示威运动的落幕

受北大示威团“先锋”的鼓舞，各地学生纷纷行动起来。尤其是北平20余所学校5000余名学生，在北平学联及各校抗日会的号召下于12月4日集结完毕。但为确保不被当局扣押，遂对外宣称以“请愿团”名义南下。期间，北大示威团学生之被困绝食、又被强行遣返的消息经各报转载，更激起学生们的义愤。但由于此次南下的学生人数众多，来源混杂，而且内部党派纷杂，加之此前北大示威团成员已明确界定“请愿”与“示威”的区别，因此途中学生内部就采取何种形式发生严重分歧：一派主张应以“请愿”方式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一派主张以“示威”的形式，迫使国民党政府服从民意。经过几场激烈的辩论，两种意见始终未能统一，学生遂决定“分家”，各自组织“请愿团”和“示威团”。

其中，坚持“请愿”的同学采用“公开外交”“对日宣战”“反对划锦州为中立区”等口号。而大部分学生则选择加入“示威团”，坚持“反对出卖东三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走狗”等诉求。^[27]12月10日，突破重重阻挠的北平南下示威团“主力军大队”终于到达南京，并与北大示威团的学生代表会面协商。次日，陆续到达南京的各校学生召开代表团会议，“交换反日意见”。期间，集结于南京的各地学生“请愿团”多次向当局请愿，但没有获得任何实际的结果。部分学生或是心灰意冷，或是被当局的回应所“软化”而陆续离开，但更多的学生则逐渐“由中立而完全倾向于斗争的一方”，

纷纷加入“示威”队伍。

国民党与日益壮大的“示威团”的矛盾不断激化,直至发展为对学生的屠杀。13日,由中大、北大发起召集,平、济、沪、京各校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筹备总示威,约定“统一宣传及口号、统一指挥及纠察”。从14日起,重组后的北平南下示威团接连三天,分别前往国民政府外交部、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示威。示威团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国民党当局则在暗中筹备武力镇压。12月17日,汇集于南京的各地学生共3万余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和《中央日报》馆联合示威。学生们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因其大门紧闭,先行砸毁国民党党徽、岗亭布告栏等党国“公器”,并将门外之警察、党部职员等7人抓去,下午又捣毁、焚烧《中央日报》报社。^[28]国民政府则出动大批警察和宪兵,在珍珠桥附近对学生进行镇压,60余名学生被逮捕,另有多名学生伤亡。次日,国民党政府又派数千军警,强行将在南京示威的各地学生遣散回籍,^[29]轰动一时的示威运动由此告一段落。

三、学生运动的余威及其影响

示威运动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反日情绪,给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以极大震慑,迫使国民党在次年1月的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已不敢轻言对日妥协。因此,此次示威运动的规模和影响,虽远比不上“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30]的“一二·九”运动,但学生“抗日救国”的革命诉求,正是由此生发,并滋养着此后的民众爱国运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此次运动揭开了中国革命走向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序幕。

(一) 打击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

此次国民党镇压学生示威运动,虽然死伤不及北洋军阀治下的“三一八”惨案,但却证明自诩“为革命奋斗”的国民政府,已的确是“一个反动政权”。虽然运动初期,国民政府针对各“请愿团体”的不同情况及激烈程度,采取“有限强制”的方法,尽可能避免流血冲突。先是要求各地军政当局约束属地学生,尽量制止学生的“非分举动”;如逼诱学生回校读书不成,则派遣特务在学生中制造纠纷,力求通过分化、改组等方式,瓦解学生组织,或将其领导机构置于党部的指导和控制之下。^[31]各地劝阻无效后,即由南京各方面负责接待,学生如有“越轨行为”则以军警强行“驱离出境”。此时国民党虽承认学生的爱国动机,但已认定其背后有共产党的指使和煽动。因此“劝阻不了,便进行威胁利诱的破坏与分化”,无计可施时,“残酷的镇压和屠杀便即开始”。但本就腐朽不堪,又“缺乏政绩”的南京政权,此次对学生“大动刀兵”,更证明“他非但不能代表民族的利益去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决战,反而当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摧残和屠杀反日的战士”。因此“从前学生群众对于国民政府多少还有幻想,还希望他实行点革命外交,还向他去请愿”,但此后“学生们这种最后的幻想就打得粉粉碎碎了”。^[32]

经此一役,国民党当局在学生眼中的“反动”色彩更浓。“国民政府”——“四个斗大的金字,辉煌煌煌闪耀在群众的眼前,但可惜这四个大字对于民众只代表贪污与剥削。”^[33]其实,此次学生“反政府示威”的爆发,及最后以武力镇压收场也有其必然性。近代化进程激发学生对“常态社会”“民主国家”的愿望和期待,造成社会动员和政治的社会参与面日益扩大。但国民党自“清党”后日益腐化,执政危机不断,却厉行高压统治,严厉禁止民众运动。在此种“国家与社会”关系下,“国民政府”在民众心中已是“一块空招牌,民众们非但没有做过‘民国’的主人,而是做了被军阀官僚剥削践踏的奴隶”。^[34]而“弱势独裁”的国民党政府不仅内部矛盾丛生,难以将民众的“政治抗争行为”制度化,更无法消除社会中的激进意识形态。在外来侵略的民族危机下,又无法满足民众的爱国诉求,只能选择以暴力镇压民众的抗议行动。如此循环往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革命也就自然屡禁不绝。

（二）促使学生运动的“民众化”

此次示威行动的另一个贡献在于，学生们对“学生运动”之下一阶段“民众运动”的思考。北大示威团虽返回北平，但“反日工作并没有完结”。^[35]学生们认为由于南京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示威期间自己的宣言和主张很少见诸报端，而政府对学生的“造谣、侮蔑、恶意的宣传、无稽的中伤”，却连篇累牍地刊载。除少数报刊外，舆论界不仅“不能予我们以正义的援助”，反而冠以“学生暴动”“学生闯祸”等标题，指责学生被“反动分子所利用”。但没有“一种报纸攻击过政府对学生的屠杀”；他们只指责学生之“越轨”，却不敢说明其原因在于“政府的卖国”。^[36]为此，示威团成员在12月30日出“专刊”，详加披露此次运动的来龙去脉，为己“正名”。

北大学生还另发专刊讨论“示威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他们自问此次示威“闹的轰轰烈烈，在报上也渲染得有声有色”，全国各地的“请愿”势力“不可谓不雄厚，情绪不可谓不高涨”；“中央党部、外交部、中央日报都捣毁得个落花流水，对政府的仇观不可能已达顶点；然而为什么经了政府的一击，遇到政府的枪炮和刺刀便立刻惨败下来呢？”其原因不在于学生意志不坚强、组织不严密，更不是因学生手无寸铁而政府掌握军队。而是因为学生是“不参加社会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只有消极的‘打倒’口号，而没有积极的主张和建议”；“唯一武器只有罢课”，但罢课不足以“动摇统治阶级基础”。何况学生既“容易兴奋起来，同时也容易消沉下去”。而工农群众的罢工和抗租、抗税，却“足以制治者阶级的死命”，且不会轻易“幻灭与消极”。^[37]

学生们更将此次示威运动与五四运动对比，明确今后学生运动的方向是“进到劳苦大众的斗争”。具体而言，这两个运动虽同为日本侵略中国而起、同为学生所主演，也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但“意义则截然不同”。五四反旧礼教反旧思想的“新文化运动”，还可以“由学生完成，而在历史上具有划分时代的意义”。但此次学生示威却“不足成为一个独立阶段”，只是“群众斗争的一个序幕”。因为“每一种运动都有他的最高点”，运动的参与者必须将其“发展为别一个更高的阶段；否则即使没有外力的压迫，它本身亦会降到一个低潮”。此次示威运动以学生在南京的活动为中心，并未形成全国响应的统一运动，致使其进程呈现骤起骤落的特征。由此，学生们也认识到今后必须“立刻深入到乡村中去、工厂中去——唤起广大的民众起来做我们运动的后盾”，“把它的内容充实起来”；只有把学生的斗争“转到广大劳苦民众的革命斗争”，示威运动才能“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者铁蹄下脱离出来，把劳苦民众从军阀剥削下解放出来”。^[38]

（三）推动中共调整学生运动政策

事变发生后，中共认为学生运动已随“广大的反帝怒潮而澎湃起来”，是“有力的反帝力量之一”，要求着意加以引导。如团中央在给团广东省委的信中就指出，要积极加入各地的“反日委员会”，以“争取部分以至全部的领导”，同时不应直接死板地提出“拥护苏联”等口号“吓退群众”。^[39]只是大革命失败后，国统区高校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当时北平的许多学生组织都“在国民党及国家主义派的手中”。^[40]此外，党、团在实践中还难免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如强调必须要在各校支部“发展势力”，与其他各派学生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斗争。^[41]要求在日益尖锐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垒”中，加强对民众的宣传和领导工作；^[42]主张通过将其他派别的“领导分子打下来”，“巩固我们政治上的胜利和坚强的组织领导”，以“统一学生运动”。^[43]然而就整个学生群体而言，许多学生虽然赞同、采用中共关于“抗日”的政治口号和革命主张，但对于“苏维埃革命”，“尚无明确的了解与坚决的信念”。加上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意识形态甚浓的口号和政策，使部分学生不愿因陷入“党派的纷争”，而分散学生抗日救国的“团结力量”，反而与中共产生嫌隙。

但中共顺应革命形势发展,顺应学生爱国诉求,及时调整方针政策,仍逐步夺回并巩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权。^[44]鉴于示威期间学生内部分化严重,中共党团一方面努力克服分裂活动,一方面采取灵活策略,等待群众“觉得请愿确是无效时”,再重新提出示威主张,从而“把群众的请愿运动转变成示威,以至于发展到更高的形式上去”。^[45]正因为此,学生的示威运动也从“书本上或文章上”,发展到在街道和机关中“直接起来与国民党统治做斗争”,甚至还产生“临时政权”性质的“民众法庭”,“由群众自己来审判反动领袖”等对国民党统治“完全反叛之行为”。^[46]这也标志着学生运动“正在转变途中”,不仅地域范围在扩大,斗争的方法和内容也都在“冲破一切的合法范围”,而“采取积极的直接行动的斗争方式”。^[47]对此,博古也认识到“必须深刻的抓住日益革命化的学生群众”,通过改善党的学生工作,在积极“促成这一转变”的同时,在“组织上巩固我们的领导”。^[48]实际上,示威运动期间中共的党、团组织也确有恢复和发展。如北大党支部此前由于遭受国民党重点打击,一度解散,直至1931年春才重组。而1931年9月至1932年1月,该支部就吸收新党员40名,党组织也重新活跃起来。^[49]

四、结 语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面前,能否团结和领导各界民众“抗日救国”,是决定学生对政府态度的根本原因。在“一二·一七”惨案的前一天,有教育界人士指出,无论示威学生之“成分”如何复杂,其动机却是单纯之“爱国心理”。无论何党何派,“能保国者,学生爱之戴之”,“不能保国者,学生恶之疾之”。而此次“南北学生之请愿运动,完全由于政府对日方针之始终暧昧而生”;“苟政府措置光明,主张一贯,则学生请愿,立谈之间即可涣然冰释,何致愈演愈烈,酿成种种不信任政府之表示?迨学生之行动既激越矣,又不思善加诱导,徒事高压,甚且以反动嫌疑,大加拘禁,吾恐压力愈大,反抗愈甚。一旦革命爆发,欲图挽救,已不可得”。^[50]此后事态的发展也确乎如此,从“请愿”到“示威”,也正是学生大规模投身“革命”的征兆。

北平南下示威团的学生更是预言:“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内部的社会生活与社会思想,显然分化出各种不同的姿态”;而“历史是一块无情的试金石,一切魑魅魍魉,都要在它的前面露出原形来”。^[51]国民党政权面对外来侵略和学生爱国行动的两副面孔,日益暴露其腐败和卖国的本质。北平南下示威团学生的呼声则“好象代表民族觉醒的曙光,敲响了出卖民族利益政府的丧钟”。^[52]但正如中共强调的那样:要想引导“学生运动走上群众斗争的道路”,在批判之余还必须“指出学生群众之真正出路”,“否则学生觉得国民党政权要不得,然而以什么来代替呢?”^[53]这是中共应当认真总结和反思的地方。^[54]而北平南下示威团的“反政府示威”,虽然只是抗战伊始,学生群体打响大规模自主反抗内外“反动势力”的“第一枪”,但就其作用而言,可视为数年之后的“一二·九”运动,以及此后学生在“第二条战线”浴血奋战的先声和预演。这便是此次北平南下示威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价值所在。

注释:

[1][14][17][32][37][38]《北京大学示威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0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第8、6-7、10、10-11、13-14、15页。

[2]当前已有学者对此次学生运动的过程作了史实重建,并着重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以及期间各派政治力量与学生的互动及其影响。相关成果主要有左双文、郭秀文:《“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的请愿示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学术研究》2006年第7期;沈成飞:《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态度——兼论影响其处理方式的主客观因素》,《学术研究》2018年第4期;陈廷湘:《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周斌:《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反日运动与党派政争》,《安徽史学》2020年第6期。

- [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年，第44、54、58页。
- [4]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期，1920年5月。
- [5]易家铎：《十字街头的中国》，《改造（上海1919）》第4卷第5期，1922年。
- [6]诚夫：《北京学界与群众运动》，《国闻周报》第2卷第36期，1925年9月20日。
- [7]《京师警察厅关于三一八惨案死伤人口调查给内务部的报告稿》，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青年运动史料（1919—1927）》，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第518—523页。
- [8]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 [9]《段祺瑞政府的通缉令》，孙敦恒编：《三一八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7页。
- [10]刘炳葵：《请愿及其他》，《醒狮周报》第10期，1926年3月27日。
- [11]邱焕星：《“中期鲁迅”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30、131页。
- [12]洪易：《革命失败后的青年情绪》，《列宁青年》第1卷第12期，1929年4月1日。
- [13]周良书：《中共高校党建史（1921—1949）》，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1—108页。
- [15][21][22][26][33][34][36][51][52]《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代表团报告》，《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第698、697、704—705、754—755、729、705、718—722、741、711页。
- [16][28]《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战斗在南京》，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390、392—394页。
- [18]《北大学生六百人昨谒副张》，《京报》1931年11月11日。
- [19]《北大学生请愿百余人昨南下》，《京报》1931年12月2日。
- [20]《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南下示威告全国民众书》，《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第569页。
- [23]《北大示威团一部昨晚返平》，《大公报》1931年12月10日。
- [24]《学生会通告：顷阅报端有人假借本会名义，捏造电报致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否认本校南下示威团情事》，《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12月8日、10日、11日、14日。
- [25]《第三批南下示威团紧要消息》，《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12月8日。
- [27][31]《“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卧轨斗争及南下示威运动的回忆》，见《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一辑，第400、402—403、399页。
- [29]《各省市学生分别遣送出京》，《申报》1931年12月19日。
- [30]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33页。
- [35]《公告：为复课问题告同学书》，《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12月18日。
- [39]《C. Y. 中央给 C. Y. 广东省委的信》，《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第382页。
- [40]《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斗争的报告》，《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北京：中央档案馆，1991年，第173—174页。
- [4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第七号》，《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第537页。
- [42]《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紧急通告第九号》，《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第561、562页。
- [43]《我们准备彻底地努力完成这个“转变”》，《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第621页。
- [44]12月1日南下的北大示威团中，中共党员岳增瑜、赵作霖、邹科嵩、扈文章四人就入选其领导机构“代表团”，岳增瑜更被选为“总指挥”。而在12月10日抵达南京的“北平示威团”中，中共北平市委成立由刘德承（后改名为林里夫）为书记，李续刚、林枫、陈沂、薛迅组成的5人秘密党团，对“推动代表团的工作与保障党的领导”起到重要作用。见《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第697页；《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一辑，第391页。
- [45]《刘德承对于北平党的批评与建议》，《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第192页。
- [46]《此次学生群众围困市政府行动之意义》，《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第607—608页。
- [47][53]《在转变途中之中国学生运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第610—611、612页。
- [48]《论学生运动目前的形势》，《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第616页。
- [49]王效挺编：《战斗中的北大共产党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8—69页。
- [50]王蕃：《“请愿”运动与国民自决运动》，《火线》第3期，1931年12月16日。
- [54]但殊为遗憾的是，此后数年内，中共临时中央又大力推行“左”倾路线，致使许多刚刚恢复的高校党组织又频遭破坏。对国民党已经失望乃至绝望的学生，还需在“一二·九”后，才得以大规模汇集到坚持抗日，且在斗争中日益成熟的中共之旗帜下。

〔责任编辑：陶婷婷〕